

青海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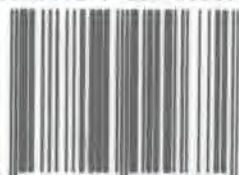
青海

新文学史论

责任编辑：安海民
封面设计：房 威
王春芳
责任印制：董四德
巢世武

QINGHAI ADVENTURE SHILUN

ISBN 978-7-225-02967-2



9 787225 029672 >

青海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青海新文学史论

刘晓林 赵成孝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海新文学史论/刘晓林,赵成孝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7-225-02967-2

I. 青… II. ①刘…②赵… III. 文学史-研究-青海省-现代 IV. I209.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7023 号

青海新文学史论

刘晓林 赵成孝 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邮政编码810001 (总编室)(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 青海地矿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书号 ISBN 978-7-225-02967-2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刘晓林，男，汉族，1965年生人，祖籍陕西西安。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20世纪文学及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坚信学术的力量不仅来自对知识的探求，而且来自对生命以及现实的关怀，人文研究尤其如此。



赵成孝 男，汉族，1951年生于青海西宁。当过10年地质工人，前后上过12年学，至今教了25年书。讷于言而慎于行，好读书不求甚解。耽于疏懒，倒也欣然。现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区域文化研究。

区域新文学文化流变研究的力作

——《青海新文学史论》序

赵宗福

当刘晓林、赵成孝二位教授送来他们的新著《青海新文学史论》书稿，提出让我写篇序的时候，我毫不犹豫且不作谦辞地一口答应了，这大概是我为人作序的经历中少有的（当然我也很少为人作序）；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却写不出一两千字的小文章来，倍感惶恐困难，同样是我为人作序的经历中少见的。仔细回味，原来各有三个原因。又反复琢磨，觉得还是不要做纵横论，老老实实地说说两方面的三个原因吧。

我与晓林、成孝二君是老同事老朋友，和成孝君还是老同学，深知他们的为人为学，那是值得称道的。二君为人耿直正派，且又坦诚热情；治学严谨规范，且锐意创新，学术品位高；教学极为敬业，恪守师道，不仅有强烈的教书育人责任感，而且对学生有鲜明的慈爱情与同情心。这有晓林君的才情、学识为师生广泛认可，成孝君在学校的“我爱我师”活动中连年被推选为“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师”作证。我有缘和如此德才兼备的优秀教授们为同事为朋友而荣幸，自然也就乐于为二君的新著作序。我甚至暗自窃喜，二君能请我作序，在他们看来，是否我也还算是正派人，也还算有点学问？这是答应作序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书稿内容跟我过去的研究兴趣一致。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

末开始，我就热衷于建国前青海地方文学史的爬梳研究，当时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完全是一片学术空白。我先从翻检各种古籍和旧报刊开始，蒐集整理各类文学史料，抄录了几千首诗词以及一批白话诗和散文小说，发现青海地方文学的材料还灿灿可观。于是分别探究作家身世文化背景，进而分类分作家撰文评述，出版发表了几本书和40多篇论文。这项工作消耗了我将近15年的时光，至今想来还情犹未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民间文化上去了。另外那时我重在对旧文学史的拓荒性梳理，学术层次不高。今天晓林、成孝君做出更高学术水平的“新文学史论”，我自然要借此机会先睹为快，并对照反思我的不足了。

原因之三是，本书的选题也还与我有关系。记得在13年前，我曾建议青海师大中文系和省文联联合写一本青海文学史，当时还召开了一个省垣作家和中文系教师参加的编写工作协商会，成孝君就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我们主张要写就写一本有一定学术水准的文学史。但是编写事项尚未正式启动，各种困难就接踵而来，这项工作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并美其名曰：“让后人去评说吧！”后来虽然出现了一些类似青海文学史的书籍，但似乎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在2002年复任青海师大中文系主任后，重新向成孝君等人建议，把青海文学史特别是新文学史的研究作为主要课题来做。现在，晓林、成孝君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形成了20多万字的高质量学术成果，我殊感不易，也深为感动，自然乐于应约作序。

经许多时日拜读“史论”，我以为这部著作堪称是青海学术史上区域文学文化流变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值得褒扬之处甚多，概其要者也有三点：

第一是鲜明的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第一生命线，陈陈相因只能使所谓的学术成果呈现出拾人牙慧、重复抄撮的可憎面目，近些年来许许多多貌似学术研究的东西已经足以使人大倒胃口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是非常艰难和十分难得的，不是抄几条材料、拣几个新词拼凑连缀而成的，而是要具有学术层次的独特眼光和逻辑严密的论证体系，自然还少不了

话语规范的表达方式。此著恰恰就是以这样的学术层次显示出了它的创新价值。

以往的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中，大多侧重于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最多也只是延伸到近代，而对国家形态转型之后的当代文学流变关注甚少，这几乎是中国区域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纵观青海文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区域文学研究中即使关注到当代文学史，也往往是流水帐式、甚至是集装箱式的堆砌描述，缺乏文学艺术层面的规律审视；或者仅仅是对个别作家创作的文艺评论，缺乏整体文化史的共时性比较把握。此著则“厚今薄古”，以青海当代文学史为研究对象，并从空间维度上的固态行政区划与文化流动空间、从艺术层面的文学个性与艺术价值来选择论述作家，并从学术层面上研究论述区域文学是如何在与历时性的地域文化和共时性的体制文化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性格气质、艺术风格和艺术思维方式、表现手法的，探索区域文学文化在中国新文学进程和区域文化演化中的地位与价值，从而使边缘化的区域文学研究有可能进入主流文化视野和主流学术领域，与主流学术圈的前沿话语对话，赢得相当的话语份额。同时摆脱了单一狭隘的作家创作时间流程的罗列式叙述范式，致力于处在时代与地域文化中的作家们心灵深层的文化解析，强烈地凸现了“史论”的学术论述特质。

正由于此，刘、赵二君在论述中从文化大视野俯瞰青海新文学史，既纵横捭阖，淋漓酣畅，又规范准确、精辟独到。从青海新文学的生成环境与萌生新绿开始，浓墨重彩地论述新文学秩序的建立，进而从文学创作实践的本质特征划分成四个时期分别加以阐述，又以昌耀最后“向着曙色的奋身一跃”作为标识，分界青海文学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世纪新文学时代的开始，可谓慧眼独具，切中轨迹。而每一章节也都闪烁着一个个耀眼的学术亮点，如“现代主义品格的追求”一节，从世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文学及其东西方文化在当代的汇融语境，首次深入而中肯地论述了区域文学中的后现代创作风格及其文化价值，不仅特别强调了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的乐钢的《雪原，

《燃烧的太阳》是其端倪，而且重点解析昌耀、杨志军作品中的种种现代品格，由此我们从中领略到了卡夫卡、艾略特、海明威、贝克特、罗布-格里耶及马尔克斯等文学巨匠所创造的文学精神与气质在青海高原上的飘荡和回应。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别具眼光的学术话题。

即使是文学背景的描写上，作者也往往能精心选择一个崭新的切入点，给人以清新自然、生动简洁的美感。比如写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时，作者从相关回忆录中敏锐地抓住一个细节：1949年9月11日的西宁街道上出现了陕北秧歌和腰鼓表演，其中“扭得特别起劲”的“一位年近四十岁的中年汉子”，这就是后来的青海省文联领导人程秀山。进而从这位特殊的文化人物揭示出青海新文学秩序建立的话语语境和政治意义。这样的表达选择何其智慧，令人欣赏！

第二是谨慎的资料梳理。记得有人说过，在庄严肃穆的学术殿堂里，提出某个新论点并不难，而支撑论点的论据则更为重要。我想这真正能支撑论点的论据其实就是亲自认真梳理过的文献资料。的确，没有可靠的论据材料，光凭着第二手资料甚至来路不明、以讹传讹的材料，不可能得出科学可信的结论，也很难建构起牢固结实的学术大厦。刘增杰在《脆弱的软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一文中就列举了由于文献材料错误而导致的五花八门的学术笑话，值得深思。我也深有体会，经常发现一些人往往从我的论著中找文献史料作论据，却又不愿意注明转引，直接抄别人的引文注释冒充自己的，进而把错译的段落或排版出现的错别字也照搬到正文中，误读之后还大加发挥，结果不是张冠李戴就是南辕北辙。如果这些人稍稍花点精力去查对一下原文，就可以避免这样那样的错误笑话。因此凡是研究一项学问，要首先把亲手爬梳相关史料并甄别真假作为基础工作来做，只有合格的材料才能真正支撑学术论证体系，才能撰写出过硬的高质量学术论著。

《青海新文学史论》在这方面又为我们树立了正面的范型。作者在写作前

和撰写中仔细翻检和阅读了大量相关文学史料，甚至在文献资料的细微处反复揣摩，力求每一个论据都能坚实有力，发挥支撑论点阐释的最佳功能。程秀山在新文学秩序建立前的出场、《雪原，燃烧的太阳》作为现代主义创作的端倪，乃至新文学演进的国内外大语境与特征形成史等等，都是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得到准确表述的。尤其是附录中近 50 位作家的小传和文学年表，不是照抄枯燥乏味的人事档案和夸饰敷衍的作家自述，而是在认真研读作家作品并归纳个性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征性学理描述，与正文的相关论述相互补充，因而显得既必不可少又相得益彰。这都得力于学术研究上执著的敬业精神和细致的文献基础，值得我们效仿。尤其是在学术氛围还不很浓郁的边远地区，有着示范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第三是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一个学者伦理观和学术涵养的体现，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大势，所谓的“学术腐败”（虽然我并不同意这样的名词）愈演愈烈，一大批“誉文公”甚嚣尘上，低层次重复和粗制滥造的文字铺天盖地，学术丑闻层出不穷，致使一批有良知的学者不得不振臂高呼“学术打假”，呼吁学术规范建设。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始一直到今天，这一跨世纪、跨学科的学术规范话题持续不断，并且出现了建设性的成果。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许多名校和研究机构也出台了关于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规章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学术规范导论》和《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

但是对某些领域和一些人来说，这些似乎还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行我素看你咋的！甚至呼吁学术规范者成了众矢之的，里外不是人。有人还在公开场合大言不惭地发表高见：专家型的研究没有什么价值，真正有水平的是从很多人的论著里整合出有社会影响的成果来。其实所谓的“整合”，说穿了就是东剽西抄，欺世盗名。试看那些从别人论著里整合出的大作，洋洋数万字乃至几十万字的篇幅，竟然连个规范的引文出处都不见，一派天外飞船横空出世的架势，使用的术语概念所指模糊，推论的逻辑表达云山雾罩，

得出的结论犹如痴人说梦，往往连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文化伦理都不要了。但是我总是想，如果大家都不从扎实的基础研究和个案研究做起，没有学术高度和独特视角，都在你抄我我抄你地“整合”，那么我们民族学术文化的结果将是如何地悲惨不堪，真是难以想象！因此我在研究生的教育中始终强调规范意识，专门花几个课时来讲学术规范。

现在欣喜地看到了这部视角独特、论证严密、资料翔实、写作规范的创新性论著，颇有“吾道不孤”的感觉。书稿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眼光和表达层次，从结构设计和语言表述都很规范，而且对前人和同行的劳动成果表示了尊重，哪怕是引用别人的一个观点、一条资料，都老老实实在地找到原文并给予注明。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真正做学问的人才会去这样做，正如只有劳动者才会真正尊重劳动一样。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强烈的学术规范性在当今学坛显得尤为珍贵。

有此三点，我安能不高兴地为此著作序呢！可以说，我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写这篇文字的。固然文无完全完美之文，从作家成就的衡量评价到流派特征的总结概括，是否很准确很到位，还有待于更多的读者来批评，或许还会引发一些不同的争论，这也是正常的。无需再赘言了，这里只用“未来事业高峰上，进步还须争百竿”的诗句与晓林君、成孝君以及同行们共勉，为规范且神圣的学术研究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而不屈不挠地进取。

刘、赵二君本来只允许我写两千字的小序，但是读其大作，既激动又感叹，引起很多联想，于是便禁不住多写了两千多字。回头看看，却又舍不得自我砍删，只好这样，字数多少甚至像序不像序的也就无所谓了。

2007年春于夏都湟滨

目 录

绪论 青海新文学写作的历史流变与文化阐释	(1)
第一章 青海新文学的发生 (1928 ~ 1949)	(15)
一、悠远的历史文化	(15)
二、青海文学的转型与新文学的萌生	(25)
三、行旅纪程与荒原新绿	(36)
第二章 追逐主流文学话语的文学拓荒 (1949 ~ 1978)	(47)
一、文学秩序的建立	(47)
二、《青海湖》的命运	(56)
三、文艺论争的时代症候	(72)
四、文学的拓荒主题与民族风情的展示	(82)
五、流放者的生存状态与写作	(93)
六、废墟边沿的惨淡小花	(105)
第三章 历史的沉思与人性的审视 (1979 ~ 1992)	(115)
一、苏醒后的理论自觉	(115)
二、“归来者”的反思与身份认同	(126)
三、昌耀：大漠中深沉的独奏者	(142)
四、艰难的人性复归	(150)
五、文学中的“天路”——青藏线	(159)
六、荒原：“自然与人”的思索	(166)
七、雪域风情与雪域历史的书写	(175)

第四章 边缘化的文学写作 (1992 ~ 2000)	(187)
一、拯救与逍遥	(187)
二、盆地：开拓者的情思	(197)
三、现代主义品格的追求	(205)
四、河湟谷地的悠长牧歌	(230)
五、精神家园的守望	(245)
附录一 青海作家小传	(261)
附录二 青海新文学年表 (1928 ~ 2000)	(287)
后记	(305)

绪论 青海新文学写作的 历史流变与文化阐释

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是由这个民族共同体中各个区域的文学创作者共同书写的。从区域文学的角度，检视 20 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可以看到那些更早接受新文化洗礼与现代精神浸润的文化中心地区，无疑承担了规约新文学发展基本路向的历史责任，奉献出了更为厚重与丰硕的文学果实。但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那些处于边地的文学写作，同样发出了虽显微弱却不乏独特性的声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尺度，自 1928 年筹备建省以后受内地新文学思潮及创作的影响，顺应时代的要求萌生的运用现代白话语言与现代文体并且体现出鲜明现代性精神的青海新文学创作，具有了成为中国新文学版图有机构成的合法依据。同时，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彼此渗透，中原汉地文化、藏传佛教及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使青海的地缘文化形态呈现出奇异而瑰丽的风貌，确保了凭借本土资源塑造自我主体形象的青海新文学在中国 20 世纪文学整体景观中的独特价值。迄今近 80 年的青海新文学史，从建国前的点滴尝试到 20 世纪 50~70 年代追逐主流话语的文学拓荒，从“文革”结束后文学创作群体的崛起及对历史、人性的深刻透视，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物欲狂潮侵袭却执著于精神家园的守护，其发展大体经历了由边缘状态的姗姗学步到参与中国新文学的整体建构并努力营造自身独特品格的流变过程。



历史上的青海这一称谓向来是作为湖泊的专名或蛮荒边地的指称出现在文人墨客的吟唱书写之中，古代诗人“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所渲染的凄凉、荒芜、粗粝的景致建构了时人对青海的基本想象。长久以来，战乱的频仍，政权的更迭，中央政府与游牧民族对这块土地拉锯式的争夺，使“青海”所指称的疆域无法确定，加之，青海又处于多种文化势力的交汇地带，因此，其文化身份始终在以中原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华夏历史中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直到1929年正式建省，“青海”才有了明确所指的地理区域，作为多民族文化融汇之地的“文化青海”的形象才得以凸现。青海新文学正是在本地现代行政制度建立之后，伴随着青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应运而生的。

现代报刊的涌现为青海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平台。1931年6月创刊的《青海民国日报》，这份有着鲜明国民党政府背景的报纸虽数次停刊，但却是1949年以前青海寿命最长的报纸，其开办的多种文艺副刊慷慨地为新文学的写作尝试贡献了大量版面。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批在南京求学的青海籍学子，本着“爱乡救国”、“促进青海建设事业”的目的，创办了属于文化评论性质的《新青海》月刊^①，其中刊载的部分文学作品可以同当时新文学的名家之作比肩。虽然在1949年以前，青海境内包括客居他乡的青海新文学写作者，还不曾拥有一份纯粹的文学报刊，但附着于官方报纸副刊和综合性刊物的新文学写作，却像是破土而出的幼芽，丛丛新绿装点着青海的文学荒原。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写作者青海新文学创作的主力。这无疑得力于新式学校对新文化的开放接纳姿态。早在1925年，青海教育界的开明人士祁中道便在北京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回青后即大力推广白话文教

① 罗麟：《解放前青海的新闻报刊》，《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育^①。在努力探求新知、敢为天下先的校园文化氛围中，本地新式学校的师生将新的文艺形式引入了当时依然保守、闭塞的青海。1928年，他们第一次把称作文明戏的话剧介绍给了青海人^②。此后，话剧演出在省城西宁内外的校园逐步活跃。抗战初期，湟川中学、昆仑中学两校学生成立业余话剧团，演出了脍炙人口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以此为抗战募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青海发行的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都有湟川、昆仑等校的中学生参与编辑，一些后来颇有成就的创作者就是在这园地完成了他们最初的文学实践。新式学校与传播媒体的联结，充分显示了青海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

内地文化对青海新文学创作的渗透与影响，使其发展始终不曾脱离新文学运动的内在规定。抗战时期，像其他中国后方省份一样，青海也接纳了许多由沦陷区避祸流亡至边地的文化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青海却意外地获得了与外界深入交流的机缘。1937年，老舍曾来西宁作了《什么叫新文学》和《怎样写作》的专题讲座，音乐家王洛宾、王云阶与画家张大千都曾在青居留。他们的到来，给遥远边地带来了新鲜的文化体验，有文化启蒙之功。对于青海新文学创作而言，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9年以前，逯登泰、李自奋的小说创作，白虹的新诗及青沙的散文创作各具特色，显示了青海新文学创作的实绩。白虹的诗集《动乱的街头》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作家阿英所作的《序言》中称该作“倾注着真挚的热情、纯洁的灵魂”，是“真正的诗”^③。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青海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并不丰硕，实际上还处于尝试、摸索的阶段，难免稚嫩、生涩，然而，一个新生婴儿的啼哭，带给人们的绝非失望而是对未来的殷切

① 《青海省志·人物志》，黄山书社2001版，第153页。

② 杨希尧口述《话剧在青海的第一次上演》，《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③ 转引自赵宗福《建国前的青海文学》，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期盼。

二

1949年以前的青海新文学创作只能说是荒原中的点点新绿，建国后才开始由边缘状态逐渐进入中国新文学的版图之中。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文学写作者大多是由内地随军或随开发建设队伍进入青海的，他们的创作大面积填补了青海新文学的空白，具有文学拓荒的意味。在这批文学拓荒者中，程秀山是特别需要提及的名字。这位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工作，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革命文化人，随西北野战军进驻西宁后，主持了20世纪50年代青海文艺界的秩序建构，他的文学活动与一系列当代青海文学草创期的重要事件关联。程秀山不仅是以自己的创作成就，更是以作为有着鲜明解放区文艺背景的领导人，规约了用统一的意识形态将文艺工作及文艺团体纳入体制的过程，或隐或显地对当时青海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发生着影响。

20世纪50年代青海文学的突出主题便是表现了建设者的劳动热情和对新生活的挚爱。一方面是对草原、雪山、戈壁、荒漠雄奇景观的赞美，另一方面又充盈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豪情。陕西作家李若冰深入柴达木腹地所创作的一组手记，勾勒了一幅幅地质队员叩击亘古荒原寻找矿藏的生活剪影，杨尚武的特写《开拓者的故事》描述了慕生忠将军引领一支工程部队在生命的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英雄传奇。此时，年轻的朱奇、白渔也为拓荒者忘我工作的热情所感染，在他们的笔下时时流淌着源自心底的赞美与感动。这种创作取向既是身处西部高原开发者的拓荒意识的体现，更是对20世纪50年代建设新中国的时代主题及昂扬的颂歌式的中心话语的追逐。这不仅仅是一种题材选择，而且蕴含着更为重要的精神指向，一是在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所唤起的对现代化中国的富强远景的想象，二是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以及对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团体的忠诚信仰，由此生成了拓荒者牺牲小我顾全